

商務印書館

華文書局第一章

創始人 | 夏瑞芳、鮑咸昌、鮑咸恩、高鳳池、張元濟、印有模

創立年份 | 1915

創店地址 | 172, South Bridge Rd



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，因应新式教科书的需求日增，这家书局在1915年于新加坡设店后掀开了岛国华文书店业的第一章。二战前，商务和中华书局凭中国版教科书长踞南洋教科书市场的龙头宝座，并进而专为本地学子规划教科书。惟如今书局门市已结业，仅保留网售与分销业务，让不少老顾客为之惋惜。

“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”，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（“商务”）奠基人张元济（1867-1959）亲书的馆门对联。这家中国国家级文化出版机构成立于1897年（清光绪23年）2月11日，由外国报馆的排字员夏瑞芳、鲍咸昌、鲍咸恩、高凤池于上海合伙创立（1954年迁至北京），张元济后于1901年注资加入，主持编译与编定教科书等工作。因时值上海印刷业迅速发展、各界高呼知识救国的契机，天时地利人和交融之下，商务发展不俗，与北京大学并誉为“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”。其也是新加坡第一家华文书局。

寄居国货，教科起家

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，新马新式华文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。由于采用新式教科书，远在中国的商务很快就注意到侨民的需求，于是新加坡成了其拓展海外业务的第一站——1912年委托位于大坡大马路摩士街詹美回教堂（Jamae Mosque）对面的曹万丰国货公司作为其“特约发行所”，代售出版品。在大举进攻市场前，商务采取寄售的方法无疑更为保险，可借此先观察南洋书业市场的需求。根据一则1916年3月20日《振南日报》的广告（署名日为1915年11月27日），除了代售商务印书馆书籍，来自上海、由无锡人士所开设的曹万丰国货公司也代售中华书局、扫叶山房、中华图书公司的出版品，自称“日增月盛南洋全权归敝局总发行所”，其也是中国重要思想杂志《新青年》（1915-1922）的两个海外发行地之一（另一家为新加坡普益印务公司），以及中国最早美术刊物《真相画报》（1912-1913）的南洋分售处。

商务公告已于1915年12月3日在上海与曹万丰国货公司取消特约发行，独立分馆订于1916年3月27日开幕。

（图片来源：《振南日报》，1916年3月22日，页6。）



随着本地新式教材需求日增，商务在1915年正式在新加坡成立其“外洋第一分馆”，首任经理为邱培枚。从商务宣告订于1916年3月27日开幕的广告（《振南日报》，同年3月22日）可知，分馆的主要业务为销售书籍（教科书为主，工具书次之，也有杂志、尺牍、小说等）、印刷用品（如铜模、铅字）、文具等，也提供承印书籍、图画、股票、商标的服务。然而，商务主理人之间在设立分馆一事上存有分歧，张元济十分主张其事，后人揣测或是因为其曾亲睹南洋“卖猪仔”（即前赴海外工作的契约华人劳工以至苦力）的景象，且赌风猖獗，希望提升华人的文教水平。

英殖时代的本地华侨怀抱浓厚的原乡情怀，急需中国货品，精神粮食自然也不例外，而当时商务和中华书局就是其中两家自许肩负推广中华文化、本地文艺与教育使命的书局，本地中小学华校生的课本、参考书多由这两大书局出版，商务从1903年开始编印教科书至1939年抗战，前后出版了18套中小学教科书。虽无具体数据显示商务教科书在南洋市场所占的比例，但根据叶伟征的研究，其所查找到的109本二战前教科书之中就有60本由商务出版，涵盖各种科目，普遍适用于新马印华校；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最新馆藏资料显示，商务是当时本地教科书的主要供应商之一。



战前商务分馆位于大坡大马路，楼分三层为仪器文具部、书籍图画部、批发部，货栈设于回教庙街32号。

（图片来源：《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 1897-1977》，页106。）